
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

涂文学

将汉口从武汉城市整体中分离出来作文化分析，完全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由于汉口城市功能结构体系中先天具有的同传统城市相异质的某种文化因子，使其在迈向近代的坎坷历程中，一直在谋求摆脱封建政治的羁绊与禁锢而走自由发展道路。它虽然毫无例外地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惠予和困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其母腹内早就埋下近代文化的种子，适逢运会使文化发生裂变而获得新生。这种情形，不仅同一水之隔的武昌、汉阳城市近代化路径大相殊异，而且在整个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也是可以纳入某类范型的。因此，对汉口近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的探寻，所获得的可能性会是超出个案城市研究而具有普遍意义。

一、“九省通衢”、“转输贸易” 与动态、多元、复合文化格局

“民族文化和地区亚文化的鉴别无疑与地理上的考虑相联系”^①。汉口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是构成其文化生成机制的首要因素。生态学和历史学都一致证明，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有一定的地理因素作为基础和前提。“居住地和水源早在人类的游牧生活时代，就是形成人类联系中地点和空间固定性的两个首要因

① 〔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素”，“布隆亨斯借一系列地图说明，各国人口聚居区都同水系的分布有密切联系”^①。在古代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许多城市都依傍于河湖干流而建，一则可顾及居民生活，得以就近饮水水源之便，二则可充分利用水运的有利条件，发展商业，汉口城市之兴就属于这种类型。对此，清人曾从风水的角度加以论列：“汉口龙脉，乃平洋龙也。平洋最宜坐空朝满，今汉口以大别为朝山，南岸为近岸，后湖空旷，正合坐空朝满之局。从前未盛者，以水未绕。明成代初，水道前通，故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汉口渐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经云：‘行到平洋莫问踪，只观水绕是真龙’。又云：‘风吹水激寿丁长，避水避风真绝地’。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实赖两岸夹住，旋绕入江。”^② 尽管上述解释颇具迷信色彩，但所说的汉口依水而兴、因水而盛则是事实。而且其风水观若以现代生态学加以诠释，与科学不乏契合之处。“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正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组结方式和人类行为活动的影响”^③，从而使人类地理因素因为自然与人为的相互联系作用产生汉口商业都会这样的城市社区。

因水而兴反映了汉口城市兴起与中外城市发展一般规律若合符节。但汉口地理与城市文明发展更有其特殊的一面，这便是地处江汉交汇之点，形成九省通衢的独特地理优势：“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遵汉水而西径安陆、襄阳、郢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

① 〔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

② 唐裔潢：《风水论》，转见范锴《汉口丛谈》卷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③ 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

河、丹江二水以至宛洛，可谓九省之会也。”^①这种水网纵横、便捷通达的地理优势，在历代文人雅士笔下曾被大肆渲染，重彩描绘，“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②。“楚北汉口，夙称巨镇，控吴皖之上游，扼江汉之门户，……襟江带河，雄视全楚，诚古今扼要之区也”^③。

环境“其本身以一贯的或规则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群体的行为”^④。水道纵横、交通便捷的地理环境对汉口城市功能格局的影响，首先就在于汉口因此而成为一个以转输贸易为主的商业港口城市，“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输运便利也，此地为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焉”^⑤。在汉口盐、米、木、花布、药材、典当六大行业中，除典当一行外，五行都以中转贸易为主。远在明末清初，汉口作为“商品转输”的港口城市地位即已确立。据清人刘廷献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⑥。考察汉口城市发展史，汉口曾经有两个发展高峰，一是以明清之际跻身“天下四大镇”之列，到清代中叶被人赞之为“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⑦，成为仅次于南北两京的又一大经济中心；二是从汉口开埠、张之洞督鄂到本世纪初叶，汉口成为“自上海外，无与伦比”的“东南都会次要之班”^⑧。这两个高峰的出现，都与“转输贸易”的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在明清时期（清中叶前），长江、汉水所带来的天然运输之便给汉口带来崛起和发展的机会，除了民间自发性的商业贸易相当活跃外，官方亦将此作为漕

① 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

② 查慎行：《敬业堂集·汉口》。

③ 官文：《汉镇堡垣记》。

④ [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

⑤ 《汉口小志·商业志》。

⑥ 《广阳杂记》卷四。

⑦ 孙嘉淦：《南游记》。

⑧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一。

粮、引盐的分销、交兑中转点，从而带动和刺激了汉口的繁盛，故时人有“汉口为九州百货备集之所，而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①，以及“帆樯林立，汉镇之繁庶遂甲于荆襄”^②等评价。

如果说，汉口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与因水运便利而形成的转输贸易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它的第二个高峰不但同样与此有关，而且因为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和京汉铁路的通航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经济格局。汉口是中国近代轮运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19世纪60年代初，汉口与上海通航，70年代末，汉口与宜昌通航。“长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为起点”^③。到20世纪初，汉口不但与长江沿线各重要城市实现了通航，而且在内河小轮船航运业方面也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一个以长江航线为主干、通达湘江、汉水内河的近代轮运网络体系。最为突出的是自19世纪70年代末汉口与外洋直接通轮，使汉口为国内对外贸易的重要转销口岸。1905年底，京汉铁路通车，使汉口在东线贯通的基础上，又有了南北沟通的现代条件，实现了真正的“九省通衢”、东西南北相交会的地理新格局。这一时期，经济的新特色是转输贸易由国内延伸至国外，汉口商业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当时资料记载说：“观近年汉口贸易额增进之数，较前几大一倍，俨然占全国通商口岸之第二位，皆此铁路之力”^④。称便的地理与繁盛的商业刺激引诱了更多的商人在此集聚，“中外商贾咸集于此，角逐竞争，商业贸易，极称繁盛”。汉口的城市地位也因此而直线上升：“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人艳称为东方芝加哥”^⑤。

① 乾隆《汉阳府志》卷二十三，《食货志》。

② 嘉庆《汉阳县志》卷十一，《盐法志》。

③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最近三十四年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

④ 张寿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宣统三年版。

⑤ 民国《夏口县志》。

“九省通衢”的地理态势和“转输贸易”的经济格局所构成的汉口自然、生态、人文特色，对汉口近代文化的生成和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从三个层次上由浅及深又互为交替而发生的。第一个层面，汉口的地理格局为汉口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得天独厚、得水独中的背景条件。对此，张之洞领悟犹深，“自沿海各省视之，则为深处之堂奥，统南北各省视之，则为适中之通衢”^①。这实际上是将汉口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沿海与内地城市相比较而区别开来。“堂奥”——“通衢”的地理格局，既不同于沿海城市（如上海）的海洋边缘特点，又有别于内地城市内陆闭塞状况，而处于一种虽处内陆但又直通外洋的半封闭半开放，既封闭又开放的过渡性状态。在文化上既与中原传统文化血脉一系，又具有与外来异域文化保持一线联系的天然孔道，既感受东南一带先进文化信息，又不断接受西北一带古老纯朴农业文化的熏染，长江和汉水不仅给汉口注入了经济的活力，而且相对削弱了汉口与外界文化的隔离机制，在文化传播渠道相对畅通的形势下，使汉口文化摆脱地域局限而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复合文化。

第二个层面，汉口“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通过人们自觉的空间意识的中介作用而对经济和文化发生影响。长期以来，一种“通”“中”——“通衢”“居中”的空间意识支配着人们在汉口展开其经济文化思路。近代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文化活动，上述空间意识无时无刻不起着重要作用。代表官方的典型者如张之洞，对汉口地位的认识是十分自觉的：“窃照湖北汉阳县属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自咸丰年间创办通商口岸以来，华洋杂处，事益纷繁”^②。他对于优先修芦汉铁路，就是基于这种“通”“中”的空间意识：“此路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三十五》。

② 《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

引分布，实为诸路领纲”^①。外人典型者则如日人水野幸吉，所著《汉口》一书对汉口这种居中的地理位置有切中要害的论析：

“汉口为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②。经济方面较为典型者如浙江籍著名商人宋炜臣“认为武汉为全国交通枢纽，在那里创办工商业，大有发展前途”^③。思想文化方面有类似空间意识的则是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留日学生：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之局卜之，吾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吾国最重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④。上述空间意识对汉口城市经济文化格局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在于，商人大规模的集聚与商品的集散流通确立了“转运分销”的经济格局；官方的重视、治理和殖民主义者的觊觎、掠夺使这种格局进一步强化，并成为近代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经济贸易中心；市民对外来文化具有某种先天性心理承受能力，文化视野较少受到狭隘的地域文化的限制而相对开阔，自觉的空间意识催生出超越地域文化的城市复合文化意识。

第三个层面，“九省通衢”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意识与“转输贸易”的经济格局交互作用，对近代汉口城市文化格局的生成提供了共同的机制和条件。这种机制的共同点都在一个“通”字上。对于地理上的“通”，前面已经有了一些论述。古代（清中叶前）交通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先天有利的条件，近代以来，商品流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地理交通向更“通”的方向进化（如京汉通轨、轮船运输业勃兴），“两通”发展的结果使汉口与外地（尤其是西洋）文化交流、接触更为广泛和直接，直启汉口人的文化开放意识和近代文明意识。在这二者所起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三十七》。

② [日]水野幸吉：《汉口》。

③ 梁绍栋：《汉口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和演变情况》，未刊稿。

④ 张继熙：《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

的作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转输贸易”所特有的商品流通规律对汉口近代文化格局的形成发生两方面的深刻影响：

其一，“转输贸易”的特点是将汉口仅仅作作为一种集散中转站，因此商品流通有聚也快散也快的特点，这种特点除了使汉口每天都迎来送往、不断接触新的人、新的商品以及由此输出的新的文化信息外，还使汉口人因长期置身于商品经济的漩涡中而培养并积淀出对商品信息乃至外界一切新的东西反映灵敏的整体素质。这种素质推及到文化观念领域便是具有普遍强烈的趋新意识。传统农业文化那种固定不变的文化秩序被一种动感极强的不断翻新的文化格局所取代：即所谓“动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①。《汉口小志》中有一段材料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特点：“国人心理崇尚新剧，前新民所排之大香山，社会趋之若鹜，而舞台之座殊觉冷淡，后大舞台排潘烈士投海与情天恨等剧，武汉人士亦喜趋之，而新民之座不觉顿减，可见人心世道好奇新，此其证也。”^②这种此起彼衰、喜新弃旧的现象，正好说明与商品经济结缘后的汉口文化变化快、花样新的特点。每一种艺术作品（当然不仅仅限于艺术）既很快会成为时尚，被人推崇、欣赏、捧场或者叫好，又很快会被人遗弃、忘记，顷刻间成为过眼云烟，再很难有什么东西会是亘古不变，被人们永远垂青，奉为圭臬。这就是近代的汉口，以及近代的汉口文化。

其二，“转输分销”不仅使汉口成为一个商品中转站，同时也成为演示与汇集东西南北文化的大舞台。各地商人不仅将四面八方的商品带进来又送出去，也附着携来所在地的文化。这种双重的携带使汉口人既享物质文明之果，又受精神文明之惠。而长期频繁交流的结果是使汉口市民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之中逐渐形成一种善于接纳融汇四方文化的健康心态，对于不同的文化都能容纳而较少一般地域文化心态中的那种排他性。汉口文化

① 俭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

② 《汉口小志·风俗志》。

也因此而显得斑斓驳杂。这里有一个很能展示这种文化现象的例子。清代，青帮洪帮在长江划分地盘，以汉口为界，汉口以上至重庆是洪帮的势力范围，汉口以下至下江皆为青帮所霸据。各自势力范围彼此都不得逾越和渗透。但汉口却是例外，青洪二帮在此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著名会党人物杨庆山不仅是洪门“栖霞山”、“太华山”寨主，而且又在上海拜在青帮头子张啸林名下，成为既洪又青的帮会两栖人物。在门派、帮规极严的帮会体系内，汉口尚能同时容纳势成水火的两个帮派，并有不少大犯忌讳、逾越常规的举动，对文化的其他方面能大度地容纳就毫不足奇了。这种文化特性所带来的效应既有正面也有负面。负面是象商品流转聚散快速无常一样，其文化也缺乏凝炼厚重，显得肤浅浮泛。“吾邑山少水多，坎流之性有余，艮止之性不足”^①，其后果是汉口虽然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内地经济贸易中心，却因为缺乏独创的文化风格而没有相应成为文化中心。正面的效应则是因广泛摄取外来文化而形成一种超地域的新的复合型文化，正如生物界一样，因为杂交产生了全新的文化品种。这种新的品种无论是低层次（如物质文化）还是高层次（如观念形态）以及中间层次（市民心态）都有大量展现。如物质文化方面，汉口很少有完全自己独创的产品，但却有一些特色产品正是在汲取外地产品优点之后再加上自己独到的工艺制作后而成为一种新的品种。武汉“汾酒”，用大麴酿造，清辣醇厚，价值昂贵，虽仿自山西，但又自成特色，故称之为“汉汾”，是典型的杂交品种。在精神文化产品方面，以戏曲为例，清代中叶，从西北经汉水随山陕商人而来的西皮的前身西秦腔和安徽商人溯江而上带来的二黄腔在汉汇合后，约在乾嘉之际，经过城市艺人的融汇创造，成为一种适应面更广、既有外来因子又有浓郁汉味的新的声腔剧种——皮黄腔。由此可见，杂，作为汉口文化的特点总是相对的，没有特点

① 《夏口县志·风土志》。

就是特点。这就是“九省通衢”与“转输贸易”地理、经济格局影响下的汉口多元复合文化格局。

二、城市结构体系非行政化与市民文化

作为一个商业城市，汉口城市结构体系一开始就具有非行政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汉口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地方行政中心，而只是一个附属于省、府和县的地方政权的商业性市镇。明代嘉靖时置汉口镇，隶属汉阳县。明末，朝廷在汉口设巡司进行管理，仍隶汉阳县。清初，增设仁义、礼智司于汉口，虽移汉阳府同知分驻汉口，但行政上的分属地位仍然没有改变。1896年，张之洞奏准将汉阳府同知改为夏口厅，实行阳夏分治，但夏口厅仍隶属汉阳府。直至1912年，夏口厅改为夏口县，汉口才成为县级行政中心，然而其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却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汉口地方政权结构的特点是因仅仅为地方政府的派出管理机构而缺少繁复重叠衙门式构架体系。其非行政中心化的后果其一是城市居民心态中政治中心感淡薄，商品经济意识不断强化。如民国以后人们仍习惯称汉口镇而不叫夏口县；其二是儒家传统伦理教化的影响相对薄弱，而非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则乘隙而生，形成有别于封建政治都会城市中正统文化的商品文化观念。

第二，“城市的空间分布特性决定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①。城市规划和市政平面结构体系与城市本身的性质是大体吻合的。中国古代城市大都具有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的性质，其城市布局模式隐含着伦理中心主义和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精神：“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②。这种布局设计的特点是以政权（宫廷

① [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

② 《周礼·考工记》。

或官府衙门)为中心,左为祭祀王族祖先的宗庙,右边是祭祀土地的社稷坛,商业市场则被安排在王宫或官衙的后面,整个城市呈正方形或长方形,街道成棋盘似方格网状结构。另外,为了军事防御需要,一般都城和省城、府城都筑有城墙和城门。这种城市布局结构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人为因素大于自然本身,充分体现出封建强权政治要求整齐划一,企图统摄一切的封建专制精神。在人与自然环境的结构秩序安排中,皇室、官吏处于主导地位,市民尤其是商人被有意识地挤排于不被重视的角落,隐含和预示着重本轻末、重农贱商的农业文明内涵。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结构却与之绝然不同。尽管在城市空间布局的规划过程中人类的科学意识无时不在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它往往又充分体现着某种内在的生态自然平衡。这种平衡机制的奥秘就是商品经济的潜在作用使然。城市社会学家们在研究这种现象时指出,生态学过程决定城市社区的内部结构。首先,“社区的基本平面分布结构是由最先形成的交通路线走向决定的,居民住宅及商业店铺最初都沿街建造,通常与街道呈平面走向”。其次,商业成为城市社区平面结构主要考虑因素,“商业区则会日益集中于地价最高的地点周围。人口增长的每一次循环,都伴随着服务项目与分布的进一步分化”^①。上述城市布局结构规律对探讨作为商业城市的汉口城市空间布局同样有效。其一,早期汉口城区布局完全是自然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生态产生。开埠前,城市街道在汉水沿岸至大江口沿线发展,上起硤口,下至堤口,绵延十余里,有正街、后街、黄陂街等主要街道二十余条,城区面积约11.2平方公里,其布局构成为一片狭长的空间地带,缺乏传统封建都会的那种方正谨严的布局特点,完全是为有利商业活动沿江沿河自然形成。进入近代,尤其是汉口开埠后,汉口城市建设开始向着特定的目标——建立商业大都市(东方芝加

① [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

哥)而进行有意识的规划活动,张之洞督鄂时,修筑后湖长堤及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城区向东北发展。不但原有的老城区地价高涨,而且“猥自后湖筑堤,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地寸金”^①。经过规划建设后的汉口城区蔚为壮观。对此,《汉口小志》曾详记其始末:“汉口旧为芦苇丛生之地,后以地当要冲,货物往来,遂变为一大镇也,至其繁盛,实可称为长江各港中第一。街市区划有三道大街,互相贯通,而横以小巷、横街等。大街两傍俱属富商巨贾新设廛肆。其外国人居留地则在街市之北。以商业卫生上观之,亦属合宜之地,现复大行整顿,更有可观矣。初当定居留地,土人索地价甚昂,故不得已多权往汉阳河岸者,其后为日既久,乃行迁徙于此也。街道宽阔,有前街、中街、后街三道,其横街则自头马路以至五马路焉,至屋舍亦极壮丽,且高楼大厦亦甚多。”^②其二,传统城市政治中心和军事防御意识在汉口空间结构布局体系中黯然失色。从保存的清朝光绪三年秋(1877)藩司刊印的《汉口镇街道图》来看,作为清朝在汉口的最高权力机构汉阳知府分同知署,并不处于在当时全城的位置,而是设在中路以北,堤街以南(相当于今大智路)一带颇为偏僻地区,传统封建城市中左祖右社之类的祭祀建设则被林立的商人会馆以及药王庙、雷祖殿之类商人祀奉的庙宇所替代。同治间为抵御捻军修筑的城墙堡垣,1906年,在汉口绅商的强烈要求和张之洞的支持下拆毁,作为封建城市的最后标记的城墙为一条后城马路所取代,“从前为人迹罕到之处,近则轮轨交通,店铺林立,几令人不可思议矣”^③。

汉口城市上述空间布局决不是街道的简单延伸和建筑物的自然堆砌。它实际上反映的是汉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某些本质性特性。首先,汉口城市空间分布构成曲折体现了汉口新型社会关

① 民国《夏口县志》。

② 《汉口小志·商业志》。

③ 民国《夏口县志》。

系结构体系，其平面结构模式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展开和商人的大量集聚，从而形成以商人和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劳动阶层为主体、与封建都会中官吏与士民为主要成员完全不同的新型城市社区。据宣统元年统计，汉口从商人数在5万人以上^①，民国初期，由于辛亥之役，汉口总人数虽大幅度减少，但从商人数与官绅士民之间的人口比例结构依然如旧。据《汉口小志》在民国二年统计，在册总人口198050人中，政军学界人数为3750人，商界人数为30990人。后者与前者的比例几近10：1。商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②。商人既然在社会关系中占有如此重的比例，其对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影响将是不难想到的。

其次，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封建礼制关于城市建构的规范大相悖异，反映了商品经济作用下城市的自由发展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汉口市民的某些近代自由精神。这种近代精神通过摆脱封建专制外在的（如城墙）和内在的（“前朝后市”结构中反映的轻商贱商价值观念）得到了鲜明却又迂回的表现。商人通过祀奉自己行业的神灵而把封建传统的祭祀对象搁在一边，从而确立一种行业的乃至城市的守护神，也正体现了谋求自由独立发展的近代价值观。

第三，城市功能结构体系长期非行政化的后果，使汉口城市文化摆脱封建政治文化的禁锢，衍生出与之对立的带有近代色彩的市民文化。汉口开埠以前，这种市民文化即已崭露风姿，有悖于传统封建礼教的所谓“薄风陋俗”已风弥汉镇。如崇奢去俭：“夫遂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隳。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③。如重利轻义，舍本逐末，“汉镇市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

① 民政部：《湖北省警务公所第一次统计书》，宣统元年。

② 《汉口小志·户口志》。

③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序》。

视”^①。如妇女逾越礼制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罕见的奢靡、怪异和开放：“烧香也，看会也，龙船也，下湖也，看戏与看花也，地方稍有胜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一任轻浮子弟评肥量瘦，眉语目眇，恬不为怪”^②，令封建士大夫发出“习俗如此，内政所以不修”^③无可奈何的长叹！进入近代以后，汉口市民文化除了在外观上更加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商业社会公从靡然向侈，男女自由恋爱，市民追功逐利等种种都市风情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开始摆脱市民文化的原生层次而发生一些质的进化，即近代文化精神从社会风俗、行为方式等浅层次向观念形态领域推行，市民的价值追求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和生活方式方面转向对群体利益及其社会地位的关注，对政治、国事的参与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等等。总而言之，汉口的市民文化由盲目、直觉升华到自觉、理性，从而与封建正统文化完全分道扬镳。比较能反映上述动向的是汉口一批民办报纸的出现以及在诸多方面与作为封建营垒的武昌报刊呈现出的差异。清末民初武昌汉口两地共有报刊约66种，其中外国人办的约13种，官办报刊12种，民办报刊41种。官办报刊中绝大多数在武昌，内容以政治与学术性居多，主要是宣传朝廷和官方意图。民办报纸中，汉口有32种，武昌仅9种。中国第一张民办报纸《昭文新报》就是由艾小梅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创办的。武昌民办报纸多为学报性质，如《军事界报纸》（月刊）介绍军事知识。《文华学界》、《楚学杂志》、《武昌群报》、《两湖通俗报》等是学报与文艺杂志。政治性新闻性报刊几乎完全阙如，充分体现了封建强权政治下文化不自由状况。汉口的民办报纸则鲜明地反映了非正统的市民文化特质。一些报纸本身就是商人所办，如《汉口新闻报》

①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序》。

② 乾隆十二年《汉阳府志·风俗志》。

③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闾閻》。

是汉口资本家附股经营和版面最多的一家报纸，汉镇巨商蔡辅卿、宋炜臣等都参与投资。因此这些报纸一般都表达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在新闻舆论方面显示汉口的市民文化与武昌的官方正统文化明显的差异。辛亥革命时期，武昌的官办报刊显得呆板沉闷，而汉口的一些报刊如《大江报》、《汉口大声日报》、《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等，则大胆抨击朝廷和地方政府，放言时政，鼓吹革命。其中《大江报》鼓吹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成为震聋发聩的革命号角。鲜明地体现出市民文化的异端特质。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汉口非行政化的城市功能结构体系虽然孕育出了上述具有异端特质的市民文化，但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却也相当明显。其主要原因同样与非行政化有关。它导致出大部分市民对政治与国事的漠不关心甚至完全无知，也使一些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缺乏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观念意识，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方面发生严重脱节。这种情形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汉口民族资产阶级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非政治化和商业社会畸形发生的另一后果是，知识文化、雅文化长期不受重视，反之则俗文化占有广大的市场，两种文化的失衡发展，从整体上妨碍市民文化超越原生层次而发展而升华。这也大概是近代汉口只能成为经济贸易中心而不能成为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在下面的篇幅里，我们还将从另外的视角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移民与俗民（FOLK）文化的畸型发展

作为一个商业都会，汉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汉口丛谈》曾作如是描绘：“汉口街道宽平，尽铺磐石，五方杂处，客旅居多，词云：‘石填街道土填坡，八马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这种“本乡人少异乡多”现象的出现，是商业贸易发达的直接后果。《嘉庆汉阳县志》说：汉口

“廛舍鳞次，民皆事贸易，盖地当天下之中，贸迁有无，互相兑代，故四方商贾輻辏于此”。清代前期，来汉口经商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南到广州，如“广州望县人多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①。东有皖赣江浙，如：“南昌之民客于武、汉而长子孙者十室居九”^②。“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③。西到山、陕等省：如“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④。这些外地客商在汉镇商业所占比重大大超过本地商人，据《夏口县志·商业志》记载，1840年以前，汉口商业会馆、公所约38个，其中本地商人所建2个，以行业划分未载地域者8个，其余皆为外地商人组建。近代以后，这种情况表面上有了变化，湖北帮成为势力最大的商帮，但这种商帮已非纯本地人，而是融汇了大量由外地落籍汉口的商人所组成。关于外地商人落籍汉口的记载在地方文献中屡见不鲜。如《汉口丛谈》：“项大德……其先歙人，祖鳞贸迁汉口，因家焉”。“王文宇……先世陕西蒲城，以艇业家汉口，阅代矣”。《夏口县志》中更多，如“田维翰……浙江上虞人，侨居汉口，遂占籍焉”。“常道性……籍芜湖，迁汉口，阅三世矣”。“李必春……江都人，贸迁于汉”等等。《夏口县志·人物志》中有传者170人，其中由外省落籍和侨寓汉口的共29人，几占总人数的1/6。

汉口的移民成分除外省商人外，主要来自本省周边农村破产农民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其中尤以黄（陂）孝（感）人为多。据史料记载，汉口城市最早的移民可能就是黄孝人，“汉口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

② 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

③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④ 《汉口山西陕西会馆志》。

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盖黄孝与汉口之关系，实先见于此”^①。清代前期，因汉江水患而破产的潜江、沔阳、天门、汉川等地难民大量流入汉口，有的从事手工业，有的运输货物，或为轿夫、车夫、舟夫等等。由于这些地区人口移居过多，而且早期都集中居住一地，因此形成黄陂街、沔阳街、咸宁码头等移民痕迹甚重的地域性街道、码头名称。

与移民问题相关的是汉口开埠后，外国商民的大量涌入。据日人水野幸吉1905年的调查统计，外商在汉口创办的主要公司、洋行、商店等共有124家，其中英国32家，德国35家，日本18家，美国12家，其他如俄国、比利时等国家27家，总计人数达2142人^②。另据统计，至1911年，汉口各国公司增至125家，人数达2862人^③。这还不包括外国在汉从事政治、外交、军事、宗教等活动的人数。

与外地居民大量移居汉口相伴随的，是由于商业的原因，社会人口流动频率过速。关于明清乃至近代汉口流动人口的频率，我们虽然一时难以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从地方志的一些相关记载中可以找到佐证。其一从港口泊船数字来看，据粗略统计，道咸年间，汉口港泊船数常不下二万四、五千艘，“载货物码头则有二十余处，所有船舶俱湾泊港内，舳舻接街，殆无隙地，仅余水中一线，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④。其二，汉口旅馆业一直十分发达，1909年有旅馆194家^⑤，到1918年增至489家^⑥。从上述两点便可窥见汉口地区人口流动的一般状况。

①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五。

② 〔日〕水野幸吉：《汉口》。

③ 转见苏云峰：《中国近代化区域研究·湖北省》（台北）。

④ 日本参谋部：《东亚港志》第五章。

⑤ 《湖北省警务公所第一次统计书》。

⑥ 《夏口县志·商业志》。

移民和人口流动对汉口文化发生深刻的影响。首先，移民使汉口社会成员构成形成地域多元化状貌。这种地域多元构成的结果是逐步通过新的经济交往形式，把农业文明中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宗法乡邻人际关系转化成一种以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的超地域多渠道相联系的网络关系，并在价值观念领域实行从心理、情感到契约、理性方面的革命性转换，使社会成员自身脱离对封建政治和伦理的依附而逐步成为自治的、独立的社会阶层。例如，各省商人最初在汉口建立的会馆和公所主要是地域性的，道光时期，这些地域性商业会馆逐渐与各行业融合，而趋向超地缘的商业组织，不过地缘影响仍然颇深。同光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帮的分业愈见专精，大量的同业公会、公所涌现。至清末，更出现了统一的商人自治性组织——商会、商团等。社会组织结构和这种变化过程，既因时代的不断进步而促成其变化，更重要的是与移民地域多元格局对传统宗法关系的冲撞与制约有关：在单一地域居中掺入外地移民形成杂交，并在更高的层次上组成新的统一的社会——文化共同体。这种历史与文化的进步与移民问题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移民们带来各自不同的区域文化使汉口文化由单一的地域文化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复合的城市文化。虽然在最初的阶段里，各省商人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企图固守本地文化传统——包括生活方式乃至一些具体的文化娱乐欣赏形式（如地方戏曲）。但最终还是被城市文化所同化，而原来由商人携有的各地文化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被加以改造吸收。这种同化与化合包括两个不同的层次，较低的层次是具体的文化样式在互相交流融合后，演化为一种新的超地域的文化形式。如前面我们谈到的山陕和安徽商人携来的各自地方戏，通过融合改造，形成新的剧种皮黄腔就是典型例证。较高的层次方面则是城市文化固有的特性一方面改变了外来移民狭隘的地域观念而迫使其加入城市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又通过改造吸收移民尤其是外国移民带来的文化使城市文化

本身形成开放、复合、多元的超地域文化结构体系。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至复合，城市移民既藉城市改变了自身的文化构成，又以被动接受与主动迎合的双重形式注塑了新的城市文化。

第三，商人和本省周边农村尤其是黄（陂）孝（感）一带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成为汉口移民的主要来源，使汉口城市社会成员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即知识阶层严重缺乏。这就给汉口城市文化的发展带来诸多严重不利因素。汉口社会成员在文化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对高雅文化的欣赏能力和兴趣，是民间通俗文艺形式的主要欣赏者；二是来自周边农村（主要是黄孝一带），是江汉地域文化（主要是通俗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播者；三是实业工人所占比例极小，据统计，在总人口198050人中，只有2221人^①，多数为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其职业多不固定，有流动不居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汉口文化与俗民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黄孝一带居民在汉口占有很大比重，几乎成为汉口的准土著居民，因此，汉口不仅在城市语言系统、风俗习惯与之有极深的渊源关系，而且一些主要通俗文艺样式也来自于这一带，如风靡汉皋的楚剧，最早就是黄孝花鼓戏。关于汉口文化与黄孝地区的渊源关系，以后我们将著专文讨论。这里所要说的是，以黄孝移民为主体的农村移民的文化素质构成和地方文化对汉口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使都市文明中过多地保存了乡野文化遗风而难以升华。这种局面本来可以藉助更高层次的移民潮流予以冲击和改造，无奈由于汉口本身城市功能和地位的限制，加之一江之隔的武昌以汉口所没有的优势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移居汉口的只能是文化素质相对低劣的商贾稷贩。关于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早在清中叶，就有人作过十分精彩的描绘：“汉口东达吴会，西通巴蜀，是以瑰货方至，纍贿纷陈，鬻良杂苦，既引既迁。居斯地者，多半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

① 《汉口小志·户口志》。

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贴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至于金石碑碣，明以前无考，后亦寥寥无可录者。”^①这段材料表明，希冀通过外来富商巨贾来改善汉口城市文化的结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表明，商人与汉口俗民文化不仅没有牴牾之处，而且往往水乳交融，相处甚洽。这无疑加剧了汉口俗文化的畸形发展。

汉口文化之俗，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教育长期未受重视，社会文化氛围缺乏对思想学术的高品位追求。汉口的教育一直仰赖于武昌，“汉口距省会府城过近，生童之文理优长者就近得以肄业，故书院尚未筹办”^②。据统计，清朝末年，汉口有小学8所，专业学校只有1所商业学堂，民国初年有普通中小学36所，专业学校只有2所^③。在全民普遍追求发财致富的社会环境中，汉口人一向存在着对知识文化的轻视态度而使知识严重贬值：“蒙馆修金不救穷，银铢茶水月收铜，蠢徒难得新书换，换日开荤面一冲”^④。这种状况的后果是带来市民更加鄙视知识而陷入拜金主义漩涡，只有铜臭味而绝少书卷气。在这个文化沙漠之中，很难容纳学术一席之地，充其量在有限的圈子内流传一些客寓文人自娱、唱酬附和的诗词歌赋而已。其二，市井细民欣赏情趣的俚俗化。近代的汉口，在街头巷尾之中，瓦肆勾栏之间，设场买唱地方小戏，摆摊围圈耍弄民间武术杂技十分活跃，构成一幅低吟浅唱、百态纷陈的繁华而杂乱的市井文化画卷。“挂灯壁上宣歌本，柱杖街心唱旧闻。半是码头为首领，手拿签字逗钱文”，“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爱听，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⑤。市民对通俗文艺的兴趣，虽然对封建正统说教文学冲击的一面，也因此滋生了象楚剧这样后

① 范锴：《汉口丛谈》卷二。

② 《汉口小志·教育志》。

③ 据《夏口县志·教育志》统计。

④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杂记》。

⑤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杂记》。

来登上大雅之堂的地方大剧种。但是，当时市井细民在欣赏情趣上不仅停留在这些俚俗小调上，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对有诲淫诲盗内容戏文的浓厚兴趣。如早期黄孝花鼓戏（楚剧前身）之所以被官方查禁，固然有维护封建正统道德的因素，但戏文大多浪语油腔、关涉风情淫海也是实情。因此，一些戏班常选择在偏僻地带，半夜开锣演出，以避官方查禁，一般市民均趋之若鹜，争相观看。其他戏曲也莫不如此，“月琴弦子与胡琴，三样和成绝妙音。啼笑巧随歌舞变，十分悲切十分淫”^①。封建文人的记述可能有偏颇失实之处，但在商品经济畸型发达的近代社会，市民对这种低级趣味文艺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倒是不难推测的历史真实。其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粗俗。汉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亦有许多不良之处，如“不讲卫生”，“粪窖便池尤为污秽不堪”^②。如随口骂人，“六亲情谊本同般，姊妹情深笑楚蛮。破口不妨伤父母，一呼舅子怒冲冠”^③。逞强称霸、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生意分行三百六，同行要比别行强。行凶打架天天有，霸道无如踩石坊”^④。同行之间的经营竞争不是靠商品质量和服务态度取胜，而是大打出手，以武力争先，完全缺乏文明经商的气质与境界。市民负性使气，奸诈狡黠、势利自私、缺乏文明的行为，也给许多来汉经商和游览的过往行人留下恶劣印象。一是码头工人欺凌旅客，强迫代提行李，“三人搬运，九人要钱”；二是坐“摆江”（渡船）时，船主往往在江中多要船费，不给不行；三是商店出价不实，因此，“讨价还价、拉拉扯扯”，折磨顾客，此种不良经营陋习向为人人诟病。

汉口俗民文化的畸型发展，固然不能完全归结到移民身上。它与汉口城市功能结构体系，与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江汉区域文化也存在着必然联系。城市文化的整体、谐调、健康发展是多重

①③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杂记》。

② 《汉口小志·风俗志》。

④ 涂翔争：《汉口琐忆》，见《湖北文献》第33期（台北）。

因素相互作用促成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是，作为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市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是十分关键的。

四、江汉区域文化对汉口城市文化的熏染与制约

江汉地区能否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文化圈，尽管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课题，但它反映出的诸多文化特征则是客观事实。特征之一是多元格局。由于江汉地区地当中原，水网纵横，交通便捷的地理环境，以及楚文化“有容乃大”的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形成了汉江人善于接纳和融汇四方文化而使地区文化显示出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其突出表现为江汉人的性格既有江浙人处事精明，为人精细的一面，又有西南、西北人秉性刚强、劲直决烈的一面，这种融睿智聪慧与狡黠强蛮为一体的国民性格，被冠之以“九头鸟”的形象喻之，深刻地反映了其复杂多元的内在文化本质。特征之二是向外拓展。汉江地处平原水乡，地狭人众，加之水患频仍，造成这一带人不拘守于故土，勇于向外开拓的文化心态。远在古代，江汉一带便因水陆便利，形成“人竞商贩，不为田业”^①的局面。迨至近世，这种状况有增无损。如黄陂人善于外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足迹遍及大半中国，有“无陂不成镇”之说。黄冈、武昌人善于经商，“湖北人在省各县市镇所设的会馆，以黄州、武昌二地商人为最多。在各省的商业活动亦然，尤以黄州帮为最”^②。天门为全国最著名的内陆侨乡。“本县人旅居外国，有早期北上到欧洲，中期南下到东南亚，近期转徙世界各地之说。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期，东乡灾民外出，大多能落在东北各省，后因沙俄帝国招募华工，始有县人应募去俄（苏联），到民国11年，先后去苏联的有1500多人。此后，其中的一部分人由苏联转徙欧洲其他国家。民国12年至民国36年，是本县人出国的最盛时期，旅外侨胞达到1.1万余人。出国路线由

① 《隋书·食货志》。

② 参见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

北上苏联转为南下至东南亚，多经两广到越南，再转徙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有乘船直接到东南亚的”^①。特征之三是急功近利。江汉人善于向外拓展的动机主要是属于谋生型的。这种谋生型的动机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通过读书而脱离乡土，走上仕途等。因此，地狭人稠，经济长期处于“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②的中等水平以及外出经商等多重因素，促成江汉人讲究实际，追功逐利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在士林风气上，片面追求功名而不重视学问之道。“湖北素称文薮，本朝文章，首推熊刘，则仍以时文掩其实用。（粤匪）寇攘以来，郡邑涂炭，文献凋残，虽经克复，而急功近名之士，又思剽窃浮艳以博荣名，向以先正之法，不能举其名，况六经精义乎”^③。这种把读书习儒仅作为改变自身的生活处境和政治地位的实用价值观念导向的结果是虽然及第为官者较多，但学术名流却很少涌现。据统计，明清历科一甲3名，湖北总人数为19名。在省份对比中，江苏为169名，浙江为129名，江西为72名，湖南为16名，湖北居第四位。反映了湖北总体文化水平基本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在清代著名学者的统计中，清顺治至道光时期，全国知名学者江苏52人，浙江26人，安徽12人，直隶11人，山东7人，河南5人，江西2人，湖北则只有熊赐履1人^④，不但与江浙难以匹敌，甚至还远远落后于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北方地区。到了近代，这种状况仍在维持。根据《中外历史人物辞典》（湖南人民出版社）统计，在近代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中，湖北为3人，湖南有7人，江苏（含上海）为13人，浙江为13人。而在官吏、军阀将领、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家中，湖北为20人，江苏（含上海）为10

① 《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隋书·地理志》。

③ 冯德材：《武昌新建经心书院记》，《湖北文征》第十一卷。

④ 参见黄绍海：《试论清代学术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华书局1987年。

人，浙江为15人。湖北较之江浙人明显为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汉人重政治而轻学术的价值取向。与此相关，在学术风气和学问路径方面，江汉学人具有悟性较强、长于思辩、不善实证的学风，以及在学术追求中以满足外在的功利需要而忽略学术内在圆满的价值取向，并由此带来的不求甚解、缺乏深厚的学术根基和后劲的状态。这种种原因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尽管“惟楚有材”，却鲜见学术名流，从根本上制约了江汉文化向深层次进展和文化内涵的升华。

江汉文化的上述特征在汉口城市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以学术人材为例，汉口文人学者的学风就深受地域学风的熏染和影响。民国初年修《夏口县志》时，编纂者在编定《人物志》后，竟发现此地杰出文化学术名流很少见于诸朝史籍，于是大发感慨：“盖夏口之名称由来久矣，三国六朝时蚤为南北共争之地，顾自秦汉以后明清以前，史册所载未见有一个焉贯夏口籍者，此何故也？且非独夏口为然，凡夏口旧与合同之汉阳郡守所同辖之黄孝川沔莫不皆然。……至有明清之际，始稍稍有一二魁梧长者名挂史籍，此吾邑吾郡人材之见端也”^①。这种现象的存在决非偶然，它与汉江文化总体风格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江汉地域文化对汉口文化的影响是既微妙又有一定限度的。从影响途径来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汉口地当汉江总汇，因在经济、地理、人文环境与整个江汉农村腹地保持密切联系，而使文化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大程度的同一性。二是汉口城市居民大多数来自江汉地区和本省各地，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和保存江汉文化的主要载体。但是，上述两点因素毕竟还是外在的。汉口城市文化之所以能融汇接纳江汉地域文化，内在的原因还在于江汉文化虽然仍属传统农业文化，但其颇具不少前近代文化因素，与近代城市文化有许多契合之处。江汉文化的多元格局与

①

城市复合文化、向外拓展行为与开放进取心态，急功近利与商人逐利意识等，都可以被有意识地加以改造而融进城市文化体系之中。当然，这种融汇汲取毕竟是有限度的。江汉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谋生型文化毕竟与近代城市商业求富型文化大相径庭。汉口文化一方面摒弃其不相契合的部分而使汲取有所保留，但同时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农业文化因素潜在影响，而使城市文化呈现非城非乡亦商亦农的畸形状态，汉口文化在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也因此而陷入难产。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涂文学，1958年生，武汉市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